

後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觀

A Poststructural View of the Structuralist Theory

彭 輝 荣

(Roger Huizung Perng)

摘要

本文說明結構主義依賴詞再現物過程中間的人為制約與符號差異作用，使二元運作模式成為目前學術界批判思考的主要方式。運用在文學理論作品詮釋三大要素（作者、文本、讀者）中，通常談的是各方牽涉的社會行為，以及如何透過符號的差異性，指涉出某些意義層面的可能性。第一段介紹結構主義之父索緒爾和他的二元運作系統，第二段導入索緒爾的語言學系統概要，第三段關照索緒爾其它的二元運作模式，如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議題，第四段看結構主義最重要的四個特性，就是差異性，系統性，相關性，和約定俗成，第五段介紹受到索緒爾和李維史托的二元運作模式影響的幾位二十世紀重要理論家，第六段談雅克慎的語言溝通圖與文學理論各學派之間的關係，第七段談敘事的科學運用結構主義的情形，第八段談及結構主義思考方式對非學院派一般人的啓示，到最後一段的結論時，則指出傅柯和威廉斯的符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特性，以及在類似的後結構主義影響下，經過蓬勃發展中的後現代主義的洗禮，今日的結構主義，非但不能說是過時的昨日黃花，而應該說是方興未艾的明日之星。

後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觀

A Poststructural View of the Structuralist Theory

Roger Huizung Perng

(彭 輝 荣)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ains how Structuralism relies on signs to represent things and material life and how its process, one that characterized by human arbitrariness and sign differences, forms binary models which become the major thought paradigms of the current critical thinking. Applied to literary theories, Structuralism often works on three aspects of interpretation (author, text, reader) to point out how differences of the signs signify social behaviors as referent. The first section introduces the person Saussure and his binary models.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his linguistic system. The third section talks about his other ideas of the binary models, such as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The fourth section explains the four ostensible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alism: those of the differential, systematic, relational, and conventional. The fifth section introduces a few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eticians influenced by Saussurian binary models and Lévi-Strauss'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The sixth section discusses Roman Jacobson's diagram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ry theories. The seventh section introduces how narratologists apply structuralism. The eighth section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ism on modern social life. The last section, serving as a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e bearings of the economics of Foucauldian and Raymond Williams' semiotics on how we should view Structural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at the moment when Postmodernism is having its prime, structuralism, far from declining, is still developing its influences onto the thought of the foreseeable future.

結構主義以發現詞 (word) 再現物 (thing) 過程中間的人為制約 (human arbitrariness) 與符號差異 (difference) 因素，而對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結構主義之父是索緒爾，他用二元方法論 (dualism) 解釋人類語言活動 (language activity) 中的符號特性，認為符號異化了語言要再現的生活事物 (material life)，使意義與符號無法成為一對一的配對關係。更重要的是，在後來發展的結構主義中，我們發現，不管是從能指的角度看，還是從所指的角度去詮釋，意義與符號都有個別產生「衍生」的複雜情形，稱為分延 (différance)。這類看法，完全顛覆了一般人對書寫 (writing) 的偏執成見，將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方面，這種情形又被用來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法律等學門，使得後現代文化研究 (如通俗文化、女性文化、以及後殖民文化) 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精神分析學上，結構主義因研究人的主體位置 (the location of the ego)，而對人類自我與社會環境的深層關係提供了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另一層思考。

莎劇《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有段女主角懷薇拉 (Viola) 和小丑費司特 (Feste) 的對話，大概可以帶領我們進入結構主義的二元建構語言世界。這個劇本表面講的是一位小女子如何透過女扮男裝，發揮機智，而求得幸福婚姻的故事，像極了女性主義的標準文本；可是深層結構談的，卻是藉著一個通俗戲劇，呈現文藝復興時期精神與物質生活樣貌，可說是莎翁最具代表性的喜劇。

其中一段是這樣的：老是令人發笑的小丑先說：I would, therefore, my sister had had no name, sir，意思是說，我真希望我妹妹沒有名字。這時候女扮男裝的女主角懷薇拉就回答：Why, man? 意思是說，你為什麼希望自己的妹妹沒有名字呢？她這個女孩兒冰雪聰明，對文字極為敏感，使人想起楊麗花歌仔戲中的楊麗花現象。小丑回答：Why, sir, her name's a word; and to dally with that word might make my sister wanton. But indeed words are very rascals since bonds disgraced them. 他的意思是說，我的妹妹是一個字，如果你跟我的妹妹交往的話，會使我的妹妹變得很浪蕩。wanton 是淫蕩的意思；這句話說，文字本身的意思很不穩定，很多人想要用契約的形式把它穩定下來，讓它們不 wanton，但是小丑說，這樣文字就變得很沒什麼意義了，會使文字失了面子。Disgrace 有丟臉的意思，小丑的意思是說，文字本身具有極大的力量，因為無論我們怎麼解釋它都通；法令也好，有些不懂文字意義的人也罷，他們常想將文字定性，使得文字失去面子。懷薇拉當然知道小丑是什麼意思，就說：Thy reason, man? 意思是說，你什麼意思？小丑的回答是：Troth, sir, I can yield you none without words; and words are grown so false, I am loath to prove reason with them. 這意思是：「我沒有辦法再跟你解釋了，因為文字很虛假，用理性去解讀，實在沒什麼意義。」小丑這番話有點耍賴，懷薇拉看出來了，因此就笑他：I warrant thou art a merry fellow and carest for nothing. 意思是說：我知道你是個很快樂的人，可以什麼都不管。merry 有不在意、無所謂、隨便的意思。小丑生性愛抬槓，既然知道懷薇拉是在跟他抬槓，其有不奉陪之理？

因此他回答：Not so, sir, I do care for something; but in my conscience, sir, I do not care for you: if that be to care for nothing, sir, I would it would make you invisible.意思是說：你這樣講就不對了，我很重視你耶，如果你認為我很隨便的話，我希望能把妳變不見。這裡，小丑是在玩文字遊戲，因為如果把懷薇拉變不見，那她就什麼都不是（nothing）了。我們要瞭解，nothing這個字，在文藝復興時候，是可以指涉女性的性器官的，對於這樣的雙關語所暗諷的意義，觀眾是知道的，但是台上的懷薇拉卻不見得可以做出什麼反應，而身為一個年輕的男演員，¹又不得不裝腔作勢做出某種反映。懷薇拉可能必須恨他只會抓話尾，要再考驗他的應變能力，因此她說：Art not thou the Lady Olivia's fool? 你不是你的女主人的小丑嗎？fool這個字，英文我們是知道的，可以當小丑，是又可以當笨蛋的意思，懷薇拉意在前者，意思是說：你不是替Lady Olivia當差嗎？但小丑當然要故意誤解她，把fool的意思解讀成「笨蛋」，所以他回答：No, indeed, sir; the Lady Olivia has no folly: she will keep no fool, sir, till she be married; and fools are as like husbands as pilchards are to herrings; the husband's the bigger: I am indeed not her fool, but her corrupter of words. Lady Olivia是另外一個女主角，Duke Orsino雇用懷薇拉，就是要她去幫忙追Lady Olivia的。小丑這裡的意思是說，Olivia不是笨蛋，不會有笨蛋隨著她，不過如果她結婚，那就不一定了；意思是說，她一旦結婚，就鐵定會變成一個笨蛋；也就是說，人不該結婚，否則有了丈夫，就好像有了笨蛋在身邊，就像herrings一般。herring是一種很好吃的魚，還是小魚兒的時候，叫做pilchards，但成為大魚時就變成herring。這句話是說fool是小魚，而husband是大魚，那比較起來，丈夫更笨，意思是說，結婚的人，都是大笨蛋，因為弄了一個笨蛋在身旁。很清楚，小丑其實是在取笑Duke Orsino癡情，而懷薇拉被派來做的事，也不怎麼高明。他自誇聰明，所以說不是Lady Olivia的「笨蛋」，而是她的corrupter of words（言語的詆毀者）。這是說，小丑在和Lady Olivia說話解悶的時候，常常需要扭曲文字的意義去取悅她。對於莎士比亞而言，這不就是身為劇作家的他的「神聖」工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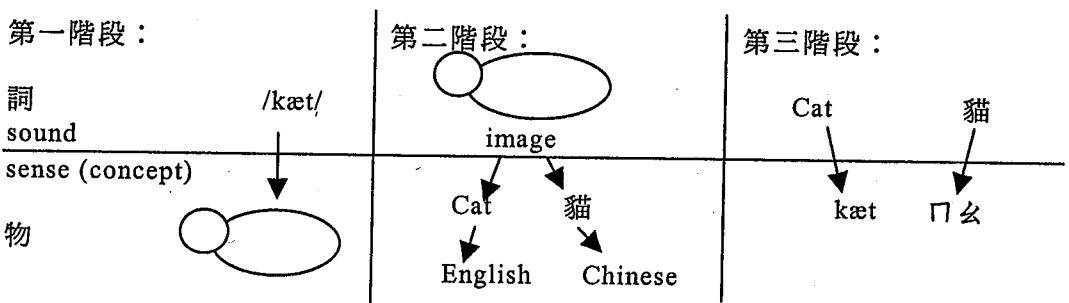
這一段短短的對話，說明了一件事：因為語言由符號組成，而且因為符號的所指並不穩定，會隨著語境(context)改變意義，從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角度來看，所以產生了所謂的「異化」的作用。²當小丑說：「我是文字的詆毀者」，他已經將他自我主體和語言符號的特性放在一起檢視。後結構主義影響下

¹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戲劇中的女性，根據律法規定，必須由小男生演出，以免傷風敗俗。可是在我看來，就是因為這樣，台上的性暗示，才會常常變得肆無忌憚。Alfred Harbage在他的《莎士比亞的觀眾》(Shakespeare's Audience)這本書中談到，莎翁戲迷多如過江之鯽，恐怕和戲臺上的性氾濫語言多少有些關係。有關莎翁戲劇中的性暗示和性語言，請參閱Gordon Williams的大部頭字典。

的結構主義觀就是這樣：它讓我們發現我們都是小丑，都是文字的詆毀者，是異化後了的符號的使用者，更是一個透過文字在找尋主體性的主體。我們依賴語言來定義自我與周遭環境的關連性，卻常常被自己所用的語言背叛，而不知如何是好。透過語言，我們在嘗試認識自己的時候，迷失了自我，結構與後結構主義告訴我們，這是為了什麼。

結構主義之父——索緒爾和他的二元運作系統

要理解結構與後結構主義，得先從結構主義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談起。此人生於十九世紀中葉(1857-1913)，大概比馬克思(1818-1883)晚上四十年左右，兩人都對人類思想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索緒爾二十世紀初死後，學生整理文稿，出版《通用語言學概論》(Course of the General Linguistics)一書，裡面完整記載他研究語言的一些偉大發明。他的母語是法語，他發現，之前的語言學研究，不過是認為語言有哲學價值而已，因此一般都將研究目標放在語言史、不同語言之間的比較、字源探究、不同系統字義的互動性等，所以語言學者和所有其他的哲學研究者，通通都被稱為語言哲學家(phiologist)，而十九世紀以前研究語言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則都被叫做studies in philology。索緒爾其實是個天才，他的看法和前人相差十萬八千里。他認為，我們應該將語言中的聲音和意義(sound and sense)加以區隔，才能理解語言定義，也才能系統性研究它。我們可以用貓和用來表達貓的符號當例子，解釋索緒爾如何區分音義。以下圖表說明聲音被區分出來，最後才符號化的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裡，詞(sound) /物(sense)被區分出來：你在描寫某種事物時，你應該要先有一個聲音出現。例如/ㄎㄞ/, /ㄔㄨ/, /ㄚㄩ 2/, /ㄓㄨㄛ ㄕ 5/等等這些，原來都只不過是聲音而已。比如，有人說/ㄓㄨㄛ ㄕ 5/，它有四隻腳，上面可以寫字、用餐，那我們就會想到桌子這類實體物。CAT這個字也代表了某種事物，人所發出的聲音/kæt/，我們知道指的是中文的貓。在第二階段裡，有了/ㄎㄞ/的聲

² 異化(alienated)一詞，是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意味的，罪人指的通常是資本主義本身。

音，就要想辦法用符號把它表示出來，以取代不在場的事物。人類發明符號（CAT或貓），就是要取代實體物，以方便有什麼不在場時候，持續進行溝通。本來文字發明以前，我們要寫貓，就要畫幾個圈圈，或在繩子上打幾個結，畫它幾個圖片來表示；後來發現這個實在不太方便，所以就利用符號來取代。到了第三個階段，人發現，符號本身具有「弑父」的功能，可以把所要代表的事物完全消滅，又具有自我亂倫的能力，可以隨意組合，無性生殖，產生無法掌控的衍生意義。³我們可以直接以符號取代貓，把貓變不見，而且更進一步，因組合的關係，還可以用符號指涉其它和貓毫不相干的人或事物。如「小貓」指乖巧，「貓王」指人，「黑貓」指邪魔，閨語指美女，而「貓空」指的並不是貓，而是一個地名。符號好像有自己的意志，隨形創意，不論怎麼變化，也會在「制約」的情況下，去無視於實體貓的存在。在人類文明史裡，事物的符號化整個過程，就是這樣：第一階段人發出聲音，如/kæt/、/tʃat/；第二階段，人發明符號去取代物的本身；第三階段，人類直接以符號代表貓，所以原來的實體貓變得不重要了，只用符號去指涉貓。貓被符號化、螺旋化，抽象化、象徵化，總之，複雜化了。

從以上這個圖表，我們發現貓及 CAT 所指的都是相同的物事，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規定的、制約的，契約式的結果。所以索緒爾得到一個定律：符號（symbol）不等於物（thing）；符號等於

詞（sound / image），一般稱為 signifier，能指，符表，符徵，意符

物或義（sense / thing），一般稱為 signified，所指，符旨，意旨

以前的語言哲學家（philologist）的觀念，是語言模仿世界，所以語言本身沒有結構；換句話說，語言可以用符號=事物（Symbol (language) = Thing）這種公式來解釋。索緒爾完全推翻這個公式，而認為語言本身是有結構的，即

$$\frac{\text{word}}{\text{thing}} = \frac{\text{sound}}{\text{sense (concept, meaning)}} = \frac{\text{象徵}}{\text{具象物}} = \frac{\text{詞}}{\text{物}}$$

也就是說，一件事物，由於再現的關係，要分成兩部分，一是可以看到摸到的，另一是看不到摸不到的。詞由聲音與符號（sound / image）組成，所以/tʃat/這個聲音，指的是四腳動物，身體毛茸茸的，很可愛，可以抓老鼠，當寵物的，稱為分子（numerator），物則由感官和物（sense/thing）所組成，指實體物，常被看成分母（Denominator）。依據索緒爾，要研究語言，兩方面都要研究。

索緒爾談語言符號（signifier）當中的聲音特性，非常有見地，我們看看下面

這個公式：

signifier = sound = hat bat mat sat cat fat chat

signified=sense (concept) = 帽子 球棒 草席 坐 貓 胖 聊天

這種公式使他發現，相似的聲音，因為只有最前面的子音有差別，意義卻可以大不相同；因此他得到一個結論：所指（signified）之產生，導因於能指（signifier）中，細微的聲音差異。我們一般人講「語氣」差、「語氣」很好，表示語氣裡頭聲音之細微差異，代表不同的意義。「差異」（difference）這個概念，從此成為結構和後結構主義裡，意義產生過程當中的溫床。這其中有一個極大的關鍵：因為人——任何種族都一樣——所發出的聲音，由於制約形成規則的關係，是有限的，如羅馬字母是二十六個，而中文音標，也只有三十九個。如何在有限的音標中（不管它們如何組合），做不同的排列組合，以應付不同時代、不同人種語言溝通的需求，是每支語言的天職。索緒爾談到，這就有如象棋的棋局一般，棋粒有限，但要讓棋局產生意義，不同的排列組合是必要的一——我們無法隨意加入任何一粒棋進來，然後說要重下，那就不合乎下棋規矩，不合乎規矩，就產生不了意義。「差異」便在這種情況之下，成為索緒爾語言學的指標性意義，後來結構主義的基礎觀念。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有易變性（mutability），但是也有不變性；時代變，它也要變，可是即便如此，舊的意義並不一定會消逝。改變的，不可能只有能指符號的聲音，或者所指的觀念和意思。事實上，形音義的改變並不重要，甚或是包含文法在內的組合方式轉變，都不是那麼重要。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轉變了。

比如說，foot 的古英文是 fot，而其複數是 foti，但是在中古英文卻變成 fet，之後在現代英文又發展成 feet (74-6)。索緒爾的這個例子代表什麼意義呢？我想應該是說明，時代在變，什麼都要變；不同時期形音義的改變，這幾個符號之間的關係也必然改變，不會原地踏步。fot、foti、fet、feet 之間的關係，在古英文、中古英文、早期現代英文、和現代英文中鐵定是不同的，比如 fet 這個字，在現代英文就不是「腳」的複數，它有別的意思；在中古英文中，現代英文 feet 不可能是「腳」的複數，因為在他的符號關係網絡當中，他必須被指涉其它意義。換句話說，每個時期都會有它的符號關係網絡，在每個時期的總和關係中，fot、foti、fet、feet 之間的關係影響所及，不可能只限定在幾個字而已，所有的符號「關係」都要改變。這就有如夫妻在一起，各自的關係總和是一個形式，離婚後，關係人都還在，沒有人怎樣，但是大家彼此之間的關係，必然要做某種程度的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又如象棋開局，我們只下第一部「仙人指路」，看起來很簡單，但是，每粒棋之間的關係已然改變了，可是，整盤棋，就還是那些棋粒，既未增一個，也未少一個，是組合關係改變了。

³ 有關於這個觀念，請參考波西亞的《模擬圖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書。

除了組合關係，索緒爾認為，語言活動必須透過規則才能讓聽者理解，如比喻用語 (figures of speech) 和修辭用語 (tropes) 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用法。他們都會隨這時代演進，而改變規則。

總之，因為符號的人為制約原則，所以面對時代的變遷，語言是無法抵擋能指與所指關係的轉變的。我們必須要接受一個觀念：語言允許任何符號形音義的組合，因此可以意義（所指）可以無限開展。⁴

索緒爾的語言學系統概要

總的來說，索緒爾的通用語言學課程在學術上的研究成果，產生了幾個影響後來結構主義的重要觀念，我們分兩個部分來看：

- 聲音部分：研究聲音如何組合成有意義的語言系統的學問，稱為語音學 (phonology)，而研究這些聲音如何發出的學問，則稱為發音學 (phonetics)。發音符號的最小單位叫音素 (phoneme)，研究音素的學問稱為音素學 (phonemics)。聲音部分的研究，對後來思想家的影響，仍然在於觀念。我們都知道，索緒爾的忠實信徒李維史托 (Lévi-Strauss) 研究神話，有所謂的「二元運作」的方法 (binary models; binary order; binary operation)，我們後面再談一些細節。二元運作原來是索緒爾研究音素，發展出「最小雙音」 (minimal pairs) 觀念產生的，如所謂的「有聲」和「無聲」的概念都是，如/g/、/k/、/b/、/p/和/d/、/t/。李維史托把這個觀念拿去研究神話，發現神話素 (mythemes) 有如音素，也有運用到最小雙音的概念，只是它是以對稱或相反的概念進行，小如男女和夫妻在人類社會扮演的互補角色，或父母對小孩子的扶養/放棄等，大到世間真理/虛假、人性的光明/黑暗，表裡不一，現世的外觀/內涵，人和人之間的愛/恨，都成為結構主義研究社會結構的基石。以上這些，都是「二元運作」的重要例子。
- 句法部分：研究句子的語法 (syntagmatic series)、構句 (morphology) 等，

⁴ 索緒爾書中的原文是這樣的：“Regardless of what the forces of change are, whether in isolation or in combination, they always result in a sh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d and the signifier... In Anglo-Saxon the preliterary form (“foot”) remained while its plural *fōtī* became *feōt* (Modern English *feet*). Regardless of the other changes that are implied, one thing is certain: there was a shift in their relationship; other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phonetic substance and the idea emerged.... Language is radically powerless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forces which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are shif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d and the signifier. This is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the sign... Language is limited by nothing in the choice of means, for apparently nothing would prevent the associating of any idea whatsoever with just any sequence of sounds” (74-6).

這種研究影響後來查曼斯基 (Noam Chomsky) 研究變形文法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探討句子的深層結構情形。除此之外，還研究語意學 (semantics) 和範型 (paradigmatic series)，看它們是互補的，還是相對的 (in opposition)。語意學探討句子的橫向組合方式 (contiguity or combination)，範型研究句子各個部份 (parts) 的可替代選擇 (selection or substitution)。這種研究後來發展成換喻 (metonymic) 和暗喻 (metaphoric) 的二元運作模式，對後現代思維產生深遠的影響。

索緒爾其它的二元運作模式

- 言語/語言 (parole / langue)：索緒爾發現，人類語言分兩種，別人的與自己的。別人講的方式和自己講話的方式是不同的，可是對於別人而言，「我」就是別人，因此，語言的本質之一是相互的：我說的話必須放在較大的社會環境中才會產生意義，「我」的話是「言語」(叫做 parole)，他人的話是「語言」(叫做 langue)。索緒爾認為「語言」(langue) 的研究比較重要，而且要將「語言」放在文化結構裡研究才對，這是他的思想重點。索緒爾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了解人類社會的語言，就必須要了解 parole 和 langue 之間的二元關係。langue 必須要依靠 parole 的存在，如果要讓人了解 parole，就要了解 langue，我們講的話才有人了解，也才有社會基礎。
- 共時性/歷時性 (Synchrony / Diachrony)：根據索緒爾，語言的歷史發展研究可分兩種，一種屬長時間的演變方面的研究，稱為歷時研究 (diachronic study)。另一種屬 period study，即將同時期語言的不同因素拿來研究，稱為共時研究 (synchronic study)。他認為共時性研究比歷時性重要，後結構主義發展出來之後，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裡頭，整個人類文化史都被符號化了，尤其是在研究同一時期的不同因子結構時，符號化的歷史，帶來許多變數，影響所及，既深且廣。比如說，研究所謂的類別 (genre) 時，我們就會發現共時性和歷時性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⁵

⁵ 在文學理論中，genre 的研究極端重要，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裡，由於符號使用的關係，被傅柯稱為 taxinomia，見《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一書，頁 72。傅柯的原文如下：What makes the totality of the Classical episteme possible is primarily the relation to a knowledge of order. When dealing with the ordering of simple natures, one has recourse to a mathesis, of which the universal method is algebra. When dealing with the ordering of complex natures (representations in general, as they are given in experience), one has to constitute a taxinomia, and to do that one has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signs.

結構主義特性

根據以上說明，天才索緒爾歸納出結構主義的四個特性，現在我們可以分述如下了：

1. 語言是具有差異性的 (differential)：如 bat, hat, cat, mat 之所以不同，在聲音之細微差異，就會產生的不同意義。老王和他的瓜的差異性，矛和盾的不同，我們是很容易理解的，不是那麼需要結構主義；可是「你我有何不同？」由於同質性高，就需要用結構主義來看了，因為自我 (identity) 實際是差異性的說法。例如我們問某某人「你是誰？」，對方什麼都可以講，但是無論她怎麼講，都不如用二元運作的模式來談清楚。例如，她說她頭髮很長，但是我們細想，很多女性頭髮也很長啊！她說她是女生，但是世界上女生占一大半；她說她姓什麼什麼，世界上姓她那個姓的，的又不只一個。換句話說，這種牽涉到身份定位的議題，我們是無法用「外在」的事物來定義的。結構主義的看法就比較科學，因為對它而言，任何事物都結構性的一面，因此我們只要說：「我既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王五，陳六，也不是蕭七，更不是施九，也不是康十」。這樣的解釋，把「你」和「我」隔開來講（或把「我」和「他人」區分出來），就關係組合而言，我們事實上已經把什麼叫「我」定義清楚了。結構主義的意思就是這樣，任何事情，對它而言，都是結構性的，問題出在於，我們要如何找出它「結構」的那一面。所以光是用事物的本身特質來理解事物本身，絕對是不夠的。老子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正反相互定義，這是看清事物最方便的方法。馬克思的思想，則提供了另一層比較複雜的同樣思考，他說：用歷史精神去理解一個時代是行不通的，我們要用那個時代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去理解它，才能分辨那個時代和別的時代的差異。⁶這是說，我們要了解事物和它旁邊周遭的關係，才有機會將事物的身份加以釐清，起碼在某種時間、某個範圍裡，應該是這樣才對。這種釐清事物定位的方式，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和凱爾那 (Douglas Kellner) 簡統稱為「認知圖像法」 (cognitive mapping)。⁷
2.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 (arbitrary, conventional)：大家講久了即成為語言，大家用久了，即成為符號，符號的形成依賴「指涉」 (signification)，而意義最後

⁶ 馬克思原文是這樣的：“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being,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Just as our opinion of an individual is not based on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so can we not judge of such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by its own consciousness; on the contrary, this consciousness must be explained rather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from the exist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cLellan 390-1).

⁷ 見《後現代理論》(Postmodern Theory)，頁 188。

的形成，則是差異。例如 BBS 講久了，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做 BBS。但是如果講給家裡的爺爺聽，他可能不一定能夠理解，而「我愛你」端看放在什麼語境，經過「差異」的認知，才會適切的產生意義。

3. 語言是系統性的 (systematic)：符號依賴封閉系統裡面的各種組合關係，才有機會產生意義，沒有系統，差異性就不會形成。例如，「車」到底是什麼，意義無限寬廣，但是如果放在「車、馬、包」中，我們一下就可以認出它的確切意義，絲毫不會有錯；把我們放在一個陌生環境，很難找到自己所在，放回標，透過它們，將座標標出，自然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了。簡言之，封閉的系統，是座標產生的先決條件。身份定位也是一樣，要找到自己，先問我們的關係網絡，釐清「我」和「他人」的座標關係，就已經成功一半了，語言更是。
4. 語言是互動的 (relational)：語言的本質因素是彼此互動的，「最小雙音」就是個重要的例子。這種二元互動的情形，用來解釋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甚至言語和語言的互動，都是很精準的。把人送到荒島去，語言不會產生意義。語言是用來溝通的，它要在人的社會裡才會有用，如果小孩子出生在荒島，長大了就不可能學會講話，因為他沒有機會接觸他人，不懂得語言座標如何標定。這個簡單的例子告訴我們，語言本質是互動的。

二元運作模式對二十世紀西洋學術思想史的影響

由於索緒爾的二元建構觀念，尤其是將能指部分的差異性和相關性、互動性、系統性的議題，講得鏗鏗有力，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家們就把符號的這種特殊概念，和言語/語言、共時/歷時等的二元觀念都合併在一起看，統稱為「結構主義中的二元運作模式」 (the binary model in structur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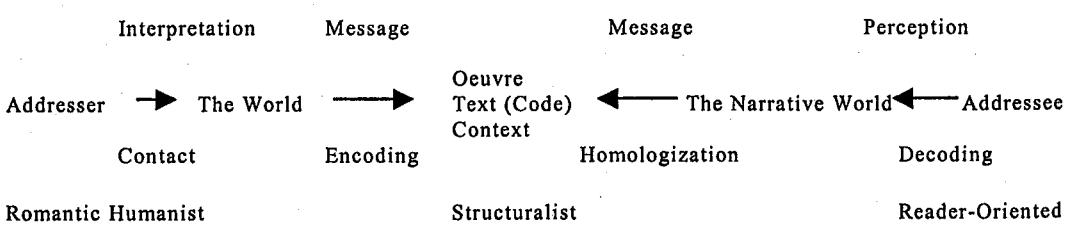
二元運作模式對二十世紀各學術領域影響所及，真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其中最著名的，最能將索緒爾的語言二元建構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就是比利時裔法國猶太人，被稱為「認知人類學家」 (cognitive anthropologist) 的李維史托了。李維史托是在巴西勝保羅大學教書時，發展出其研究特色的。時間是一九三零年代，他在中南美洲觀察土族文化時，藉由圖騰，找出人類文化裡依賴差異性、相關性、互動性、系統性去製造意義的情況。他利用神話解析土著文化，發現神話確實擁有語言符號的功能 (Myths function like languages)。在文化中，神話就有如索緒爾語言學中的 parole，而文化即是 langue，其中神話素 (mythemes) 的概念，更直接取之於音素 (phonemes) 的概念，因此「最小雙音」的觀念在他的神話論述系統中，到處可見鬼斧神工式的斧鑿痕跡。我們接觸這個視野遼闊的思想系統，常常感受到二元建構概念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威力實在其大無比。比如說，在圖騰系統中，圖騰的內涵是不具意義的，圖騰就像語言符號中的能指概念，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才是它們在土著文化中真正的

功能。李維史托說，在姻親關係中，甥舅之間關係對母舅關係來說，就有如父子之間的關係對上父母的關係。假如甥舅彼此關係好，父母彼此關係也好，那母舅彼此和父子彼此的關係就不會好；反過來說，如果母舅彼此和父子彼此的關係還好，那甥舅彼此和父母彼此的關係就不可能太好。原因很簡單，由於土著家族彼此之間送往迎來的習俗，就和我們中國人姻親家族之間很像，如果母親在我們的家族不被善待，那當然就會有可能出現甥舅不合等的情形。

由於結構主義的「二元運作模式」結構性堅強，對後來的哲學家們造成了極大的挑戰門檻，挑戰成功者固然有之，如德西達；但持續加以運用，而成為極為成功的思想家的，也在所多有，如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和拉康即是。其實，要理解二元運作的例子不難，相反詞中很多概念都適用，如善良/邪惡、男性/女性、光明/黑暗等均是，只是運用到抽象的概念時，像李維史托談的文化/自然（culture/nature），複雜度就會增加許多。

雅克慎的語言溝通圖與後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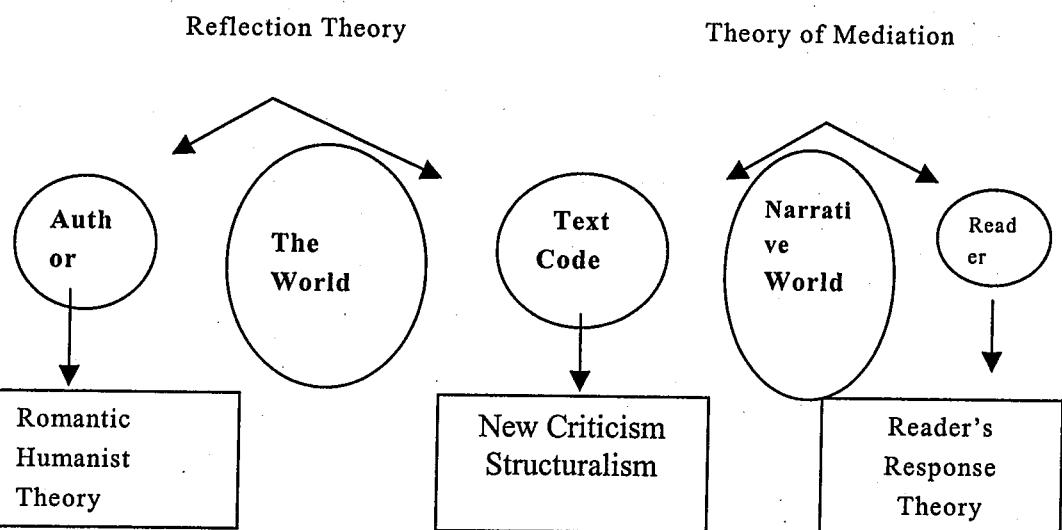
李維史托之後，還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受到二元建構的觀念極大的影響，那就是雅克慎（Roman Jacobson），他不但對語言學有影響，對精神分析學和文學，更有巨大的衝擊。這位專門研究語言暗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之差異的語言科學家發現，失語症的病人會在兩種極端當中擺盪，即所謂的暗喻極端和轉喻極端（metaphoric pole and metonymic pole）。他認為，浪漫時期的詩人，擅長暗喻，善於為文字找相似詞，發展無比的想像力；而現實主義的小說家（realist）則擅長轉喻，善於語言活動的橫向組合，但對縱向選擇就不擅長。他以結構主義的觀念分析作者（author）、作品（work）和讀者（reader）的關係，發展出一張語言交流圖（diagram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⁸這邊我稍微做了一些修改，說明在他的文學理論系統中，現實世界和詮釋者的虛擬世界（the narrative world）位置：



⁸ 見 Raman Selden 和 Peter Widdowson 寫的《當代文學理論讀者導讀》（*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第四版），頁 4-5。

這張圖表說明文學裡的語言活動分成兩個階段，上半段是這樣的：作者感受到現實世界、接觸周遭環境（the world/context），經過詮釋（interpretation），產生訊息（message），訊息透過建碼（encoding），然後產生文本（oeuvre）。下半段的活動則以文本開始，經過讀者模擬（homologization），產生虛擬世界，再經過解碼（decoding），收到訊息。

這個看似簡單的圖表，事實上在眾多的論著裡，常常被用來解釋大家耳熟能詳又不同學派的文學理論。我歸納一下，畫了以下這張圖：



從這張語言溝通圖我們可以看出，建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是中心，往兩方伸展而成文本建構和解讀，因此詮釋被結構主義看成是建碼和解碼的過程。

浪漫時期的人本理論（romantic humanist theory）的意思是說，十九世紀時期以前的文學評論者，大部分將重心放在研究作者的生平、道德精神等，而表現理論（expression theory）則指的是研究詩人墨客用文字表達感情的方法；想像力理論（imagination theory）指十九世紀浪漫時期探討想像力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的理論，新批評（New Criticism）則指的是美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派，焦距放在文學作品的文字和結構研究。⁹讀者反應理論（reader's response theory）專門研究讀者的閱讀現象，如果將美學也帶進來，就稱謂為接收美學（theory of aesthetic reception）。我們注意到，當作者將所接觸到的真實世界反映於作品裡時，就被稱為反映理論（reflection theory），在這張圖表中，這個理論包含前半段的語言活動；至於後半段，我們要從右到左往回看，我們會發現，從作者至文本，讀者閱讀文本，使得文本意義有如能指的所指一般（the signifier's signifieds），受到

⁹ 這個學派又被大評論家威雷克（René Wellek）在他第三版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稱為內緣研究。

影響。這整個過程，被稱為仲裁理論（theory of mediation）。¹⁰

¹⁰ 有關於這一段所牽涉的理論背景，我想我們第一本要讀的書是阿部藍姆斯（M. H. Abrams）的《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本書的第一章主要談的是十九到二十世紀的主要文學理論學派，阿部藍姆斯綜合了前人看法，認為到 1953 年為止，文學理論可分模擬理論（mimetic theories）、實用理論（pragmatic theories）、表現理論（expressive theories）、和客觀理論（objective theories）等四種。所謂的模擬理論是“art as essentially an imitation of aspects of the universe”；實用理論指文學既可以提供娛樂，又可以教導改變人的氣質，增進人的道德觀，可謂寓教於樂；表現理論的解釋是“A work of art is essentially the internal made external, resulting from a creative process operating under the impulse of feeling, and embodying the combined product of the poet's perceptions,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e primary source and subject matter of a poem, therefore, are the attributes and actions of the poet's own mind; or if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hen these only as they are converted from fact to poetry by the feelings and operations of the poet's mind。”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說法比較清楚一些，他說：“Poetry is ‘the expression or uttering forth of feeling’”。阿部藍姆斯談表現理論，提了四個重點研究方向：1. 詩的種類（the poetic kinds），2. 把感情自然流露看成是重要的衡量標準（spontaneity as criterion），3. 外在世界（external world），4. 觀眾（the audience）。至於所謂的客觀理論，指的是形式主義中的內緣研究，阿部藍姆斯說，客觀理論 regards the work of art in isolation from all these external points of reference, analyzes it as a self-sufficient entity constituted by its parts in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and sets out to judge it solely by criteria intrinsic to its own mode of being（以上見頁 6-29）。布列斯勒（Charles Bressler）在他的第三版《文學批評：理論與實際導讀》（*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談的所謂反映理論（reflection theory），則引用了魯卡奇，因為魯卡奇認為所有的文學因子都洩漏階級衝突，有效揭露經濟下層結構和表現在藝術層次的上層結構的關係。因此簡單講，毫無疑問的，文本直接「反映」社會意識（a detailed analysis of symbols, images, and other literary devices would ultimately reveal class conflict and effectively expose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reflected in art. Known as reflection theory, this approach to literary analysis declares that texts directly reflect a society's consciousness.）。英國法蘭克福學派代表性人物，也是文化唯物論的重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班內特（Tony Bennett）則不認為反映理論的主張是對的，都認為仲裁理論（theory of mediation）比較有道理。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說：Mediation was intended to describe an active process. Its predominant general sense had been an act of intercession, reconciliation, or interpretation between adversaries or strangers. In idealist philosophy it had been a concept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opposites, within a totality. A more neutral sense had also developed,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separate forces. 而班內特在《文學之外》（*Outside Literature*）這本書的解釋，就比較簡單，仲裁指的是 the problem of how to theoris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hile also retaining the separateness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換句話說，他們都認為從作家到作品，未必全然是作品反映社會，因為讀者仲裁的結果，會產生很多不同的過程，都需要理論家去注意。

通常使用這張圖表的理論家，像雅克慎、Raman Selden、以及伊果頓在他的《文學理論導讀》所表現出來的，目的在說明不同文學理論的焦聚在什麼地方。評論家們大概都認為，文學理論光譜大約不出作品詮釋三大要素的範疇，也就是大約在作者、文本、讀者圈圈中左右遊走，而文學的結構主義研究中心，焦聚通常被認為是在比較狹窄的文本（text）上。

結構主義從十九世紀開始，發展一個世紀以來，有很多誤解，可以說是毀譽參半，伊果頓就曾經說：「結構主義將現實事物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的同時，也很不幸忽略主體；是這個雙重的排除，給所謂的結構主義工程下了定義，既不講現實事物，更不替個人表達什麼：兩者都故意被排除，使得中間剩下的，是一籠筐的規則。這個規則系統有生命，但絕不理會個人意向的呼喚，因此溫和的說，結構主義對主體有偏見，倒不如說，主體早已被消滅，唯一剩下的功能，就是變成和個人毫不相干的結構。」¹¹ 又說：「結構主義是個騙子，故做規矩，對價值判斷視而不見……說它是研究方法而已，是昧於事實；這個理論早就已經被異化了，藉著科學實踐外殼，全面掌控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層面。」¹² 伊果頓是個激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一九八零年代這樣痛斥結構主義，在「新批評」仍然遍行於英文研究的學術界的時候，心情不難理解；但是從今天結構主義發展的情況看來，我們該給的，是多些讚美，而不是批判而已。在我看來，當時的伊果頓恐怕是忽略了後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觀，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用「新批評」的角度去看它了。

舉拉康（Jacques Lacan）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structuralist psychoanalysis）為例，不給結構主義它應得的功勞，似乎說不過去。拉康傳承雅克慎的二元建構觀念，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在文學理論的範疇，拉康大概是二十世紀繼弗洛伊德之後，最偉大的精神分析學家。他雖然說要「回歸弗洛伊德」，但一九八零年代之後，理論界可說只有拉康，而沒有弗洛伊德和榮格了。¹³

¹¹ 見伊果頓的《文學理論導讀》（*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頁 112：“At the same moment as structuralism bracketed off the real object, it bracketed off the human subject. Indeed it is this double movement which defines the structuralist project. The work neither refers to an object, nor is the expression of an individual subject: both of these are blocked out, and what is left hanging in the air between them is a system of rules. This system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life, and will not stoop to the beck and call of individual intentions. To say that structuralism has a problem with the individual subject is to put it mildly: that subject was effectively liquidated, reduced to the function of an impersonal structure.”

¹² 同上，頁 122：“The prudishness of structuralism's evasion of value judgements....was more than just a fact about its method. It suggested the extent to which structuralism was the dupe of an alienated theor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ne powerfully dominant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¹³ 讀幾個小時的王國芳和郭本禹的入門書《拉岡》，我們會很崇拜這位偉大的精神分析學家對文學理論的貢獻的。

敘事的科學

「結構主義敘事學」(narratology)號稱「敘事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narrative)，研究的是敘事文學中的結構因子。相關的理論家包含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托得洛夫(Tzvetan Todorov)、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和吉內特(Gérard Genette)等人，這些人大部分都以評論小說著稱於世。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文學有類似語言的結構(Literature functions like language)不是文學使用語言(Literature uses language)，而是文學和語言都以同樣的方式產生意義。比如語言要有什麼意義，就要依賴句型中〈主詞+動詞〉這樣的公式。對他們來說，文學也是如此。以普洛普為例，在《童話故事構詞學》(The Morphology of the Fairy Tales)中，他認為說個童話故事就像講話，也有〈主詞+動詞〉等的語言結構，因此構詞學(morphology)是很值得研究的。比如說，如果我們能將這樣的公式看成是語言的標準結構的話，就能找出童話故事的一般性構詞學。他所舉的例子，泰半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 a. 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後母、巫婆、王子、公主
- b. 灰姑娘(Cinderella)：後母、巫婆、王子、公主
- c. 白雪公主(Snow White)：後母、巫婆、王子、公主

普洛普認為，從這三個我們非常熟悉的童話故事看得出來，中間細節部分是有些差異，但是〈主詞+動詞〉結構卻很類似。換句話說，人物之間的動詞關係，說明了童話情節大概如何發展，好比下段要談的諾姆查曼斯基(Noam Chomsky)的「變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如何說明語言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的變化，他也認為童話故事的構詞變化可以依樣畫葫蘆去考究。就好像句型，事實上我們只需要懂得基本變化，就可以抓住其它所有附帶變化。在這三種子句等隨意插入，主要句型仍然可以分析出來。這種理解「主要句型」的方式，被看成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在結論中，普洛普總共為童話故事找出三十一種構詞因子，在故事中被交互運用，即便只是部分出現，也不妨礙。

總之，我們仔細看普洛普，發現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四種特質，如差異性、系統性、關連性、和人為制約，在裡面都找得到，因為句型的變化，代表著符號系統中，幾個因子的交換組合而已，符號的變化重點在凸顯結構主義的特性。對而言，意義的產生不是內蘊的，而是差異的結果。只要能預測符號變化，就不難找出童話故事的情節發展方向。我們可以看出來，很明顯的，這種分析童話故事的方式，是運用結構主義的結果。後來的結構主義敘事學評論家就常常用這個模式，來解析很複雜的大部頭嚴肅小說。

查曼斯基與羅蘭巴特的後結構主義觀

查曼斯基是理論語言學的大師，利用二元建構的觀念，發明了語言中的「表現」(performance)與「能力」(competence)的差異。這個觀念，影響卡勒(Jonathan Culler)談的所謂的「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的議題，為「讀者反應理論」(Reader's Response Theory)另闢了蹊徑。卡勒認為，普洛普等人所提出的理論和應用，仍未超越索緒爾所說的個人的語言(parole)的範疇，而結構主義真正應該討論的，不是個人語言，而是語言系統(langue)，也就是「詮釋的行為」(the behavior of interpretation)。他相信，這個行為必須以敘事結構學來討論，才能說明語言是如何製造意義的。這個理論常常被歸入讀者反應理論的範疇，因為它真正的意涵，是要探討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係，主張文本本身不會有本體性；是讀者自己在接觸文本的時候，因為本身所處時代差異、背景不同等原因，會依符號的功能發展出不同的解析規則。總之，不同的文本解析規則為何，才是卡勒在他那本書《結構主義詩學》(Structuralist Poetics)所要討論的課題。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也差不多是同時期受到影響的一位法國的思想家。他利用服裝在人類文化中的作用，解析差異性等結構主義的特性如何在複雜的社會文化活動中，產生既簡單、又符合禮節的重大意義。讀他的書，我們會覺得對他而言，西裝和旗袍代表符號，牛仔褲和女性時裝中的墊肩，也都是符號組合關係的一種展現，因為在時裝的語言系統中，所有的流行服飾只遵守一個規則：符號之間的系統互動關係，以及其中的差異性。每種款式都是parole，parole依賴符號的組合產生意義。它們可以在相似中取得差異性，也可以在差異性中取得相似性。穿西裝和穿三十元一件的T-Shirt所產生差異性，才是不同的流行衣飾產生意義的原因。換句話說，穿西裝、打領帶、戴金飾扣，即表示穿戴了某一套符號在身上，符號是人為制約的，因為給予符號意義的是人。鞋子可分為女鞋、男鞋、皮鞋、高跟鞋、球鞋、布鞋、慢跑鞋、籃球鞋、高球鞋、網球鞋等等，而這些分法產生的是符號價值，並非真的那麼具使用價值(use value)，其實功能在於某種封閉的系統層面中，互動之後產生的差異性。羅蘭巴特稱這種觀點為符號價值觀(semiotic value)。他還談到所謂「讀者的」和「作者的文本」(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前者指有基本指涉(references)的文本，比較不那麼具可讀性，後者指讓讀者隨意從任何一個方向去理解、創造意義的文本，當然比較值得鼓勵去寫。¹⁴

¹⁴ 羅蘭巴特的名著S/Z原文是這樣的：“What evaluation finds is precisely this value: what can be written (rewritten) today: the writerly. Why is the writerly our value? Because the goal of literary work (of literature as work) is to make the reader no longer a consumer, but a producer of the text. Our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itiless divorce which the literary institution maintains between the producer of the text and its user, between its owner and its customer, between its author and its reader. This reader is thereby plunged into a

結構主義符號學對一般人的啟示

二十世紀上半葉結構主義的發展，就是由以上談到的這些思想家們所奠定的。此後，結構主義就已經被看成解析社會風俗習慣與行為（social behavior; social practice）的重要方法。

我們試想，幾年前，一位臺大法律系學生因為別人有手機而自己沒有，便搶他人的錢財去買被抓到。整個社會都為這件事情感到難過，後來法官原諒他給予緩刑。究其原因，據他所說，他搶錢買手機最重要的目的，並非是為了要方便聯絡他人，事實上他只是要「有」，希望和他人「平等」。對他而言，使用價值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符號價值，因為手機使他覺得和同學達到同樣地位，這是「差異性中的相似性」的一個簡單例子。我們理解這種看事情的方法，再拿來看文學作品，會有不同的認知。

我們更可以從結構主義來探究什麼叫做做大官。做大官的價值事實上也是符號價值，因為當大官，並不就代表我們的「內涵」比他人要強，或「更富有高明」，而是在社會關係網絡的差異當中，佔到制高點。李維史托研究筆下的土著，也是這樣，鷹族看起來雖然比鴿族佔的地理位置較高，事實上他們只是不同的部落而已，鷹族這個圖騰，並不會使得他們比鴿族勇敢或「飛」得更高、更遠、更快，鷹、鴿、熊、豹、虎不過是用來分辨各部落在山中佔據的地理位置，看那個部落住得高而已。總之，在人為制約情況下，當社會結構中，某一個符號產生了它的系統價值時，是因為有一個差異性的需要，透過這個差異性，身份便可加以定位，並無「哪一個比較強」的意思。¹⁵對結構主義者而言，任何社會風俗習慣與行為都是人為制約與差異性需要的一種表現。找出人為制約的行為中，符表和符指怎麼結合，才是符號學（semiology; semiotics）的重點。

傅柯和威廉斯談結構主義符號學

傅柯（Michel Foucault）是個偉大的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也是影響文學「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開山祖師綠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最大的思

kind of idleness—he is intransitive; he is, in short, *serious*: instead of functioning himself, instead of gaining access to the magic of the signifier, to the pleasure of writing, he is left with no more than the poor freedom ei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text: reading is nothing more than a *referendum*. Opposite the writerly text, then, is its countervalue, its negative, reactive value: what can be read, but not written: the *readerly*. We call any readerly text a classic text”(4).

¹⁵ 見《野蠻心靈中》（*The Savage Mind*），〈具體意義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Concrete）一文。

想家。¹⁶他有一段話談結構主義符號學，雖然抽象，卻非常有意義。在這邊，我們拿來做為結論，很適合我們理解後結構主義影響下的結構主義觀：

Let us call the totality of the learning and skills that enable one to make the signs speak and to discover their meaning, hermeneutics; let us call the totality of the learning and skills that enable one to distinguish the location of the signs, to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them as signs, and to know how and by what laws they are linked, semiology: the sixteenth century superimposed hermeneutics and semiology in the form of similitude. To search for a meaning is to bring to light a resemblance. To search for the law governing signs is to discover the things that are alike. The grammar of beings is an exegesis of these things. And what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has to tell us is quite simply what the syntax is that binds them together.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ir coexistence,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linked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eir resemblance. (29-30).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sig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this]: signs...were constituted by resemblances which, in turn, necessitated further signs in order to be recognized. (172)

Money...receives its value from its pure function as sign. (176)

我們先解釋何謂詮釋學。詮釋學（hermeneutics）原來是闡釋宗教義理的學問，是「聖經學」（就像「紅學」一樣）的分支，源於德國，主要代表性人物有西賴爾瑪荷（Schleiermacher）、狄爾泰（Dilthey）、海德格（Heidegger）、迦德墨（Gadamer）。詮釋學後來的發展，並非全部都用在聖經，不過卻把文本詮釋的本質加深加廣化。¹⁷依照傳統去闡釋聖經的方法，被傅柯延用申論，成為符號詮釋的方法與技巧。很顯然的，不管談解碼或建碼，傅柯都稱之為 hermeneutics，其實就是英文各式各類的 interpretation 的意思。在這裡談歐洲十六世紀事物的秩序，傅柯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有四個特性值得我們注意：

1. 它可區分符號出現的所在地（the locations of signs）；
2. 它可定義符號的主要結構（to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as signs）；
3. 它可結合符號和所在地（to know how and by what laws they are linked）：結構

¹⁶ 綠布萊特也是第七版《諾頓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諾頓莎士比亞全集》（Norton Shakespeare）的主編。在過去幾十年來，前者一向廣為國內各大學外文系教師於授「英國文學」課程時所用，而後者也於幾年前出版後取代了Riverside Shakespeare 成為最受歡迎的莎劇選讀課本。

¹⁷ 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的第二章最重要的部分，談的就是詮釋學。另請參閱 Richard Palmer 的《詮釋學》（Hermeneutics）一書，裡面對這四位重要的詮釋學代表性人物有詳盡的介紹。

主義最重要的研究，就是要將符號跟符號的所在地結合起來看，即「人為制約」的概念，符號並無內蘊意義（internal meaning; intrinsic meaning），也沒有什麼「基本意義」（quintessential meaning）。比如人為什麼要在結婚當天穿西裝或做頭髮？「穿西裝」這個動作有沒有本質上的意義呢？如果去除人為規定的意義，「穿西裝」還會有意義嗎？答案是沒有，因為「人為制約」的特性是 conventional 的問題，很 arbitrary，使得穿西裝變成正式的同意詞。我們可以問：為什麼不穿長袍馬褂呢？新娘子為什麼不戴頭蓋呢？所謂「掀起你的蓋頭來」不是嗎？因為時間變了、所在地改了，時空換了。新娘戴頭蓋是以前的社會風俗習慣中的系統規則的一部份，現代的差異性的需求，要求我們在新的社會行為中，重新排列組合，找出新的符號關係。結構主義的學問，就是將符號跟所在地連結起來的學問。

4. 符號所在的時空還有它的「經濟」特性：當傅柯說：「金錢只有變成符號時才有功能」（Money receives its value from its pure function as sign），而十六世紀時「符號由相似性（resemblances）建構而成，進而產生更多的符號，以便認得」（signs...were constituted by resemblances which, in turn, necessitated further signs in order to be recognized），我們瞭解到，符號在它所隸屬的時空中有它的複雜經濟特性，這種性質經歷相似性中的差異性需求，提供了結構主義者極為寬廣的研究空間。傅柯將書名訂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原因也在這裡。

傅柯的這些看法，可以拿來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那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和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中的主張作個比較。威廉斯是英國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的最重要代表性人物，有鑑於文學的社會學總是講得過於浮面，過於「形而上」而離不開意識形態，他說：

我們可以運用文化符號學（cultural semiotics）來研究符號系統如何成為社會關係的細部結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內在部分，符號依賴關係所形成，也在關係裡形成；外在部分，符號系統依賴機構成為形貌，也在機構裡成為形貌（這類機構既是文化的，也是社會和經濟的）；而整體來看，如果我們對符號系統的瞭解妥切，那它既是特殊的文化技術，又是特殊而實際的意識形式。這些不同層面，實際上在「物化社會過程」（material social process）中早就已經被符號系統整合了。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當下的一些攝影和電影作品，書籍出版工作，和繪畫作品及其複製品，乃至於電視中的影像生產等等研究，都可以看成是「文化的社會學」所可以涵蓋的新目標。我們相信，物化社會過程的層面雖然多，但在文化符號學中，沒有任何一個會那麼容易被排除，而且在這些研究當中，從積極形成的關係，一直到它的實際產品，

都已經鉅細靡遺的、結構性的透過相似性中的差異性被連結起來，因此這些研究，既可稱之為「社會學」，又可稱之為「美學」。¹⁸

威廉斯寫這段話時，是一九七七年，比傅柯的《事物的秩序》晚上十一年。在當時，結構主義在哲學界已然盛行好幾十年，正進入被批判，被德西達「解構」的階段，但在英美文學界，才正方興未艾。威廉斯這裡所提出的文化符號學，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比傅柯的符號學要細膩些，因為他的重點是在研究文學中的「物化社會過程」：可以看出來，後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觀，已經從語言的內在差異性研究，發展到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馬克思主義比較關心的層面的複雜外在研究。對這兩位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至鉅的大師而言，事物的秩序，來自於社會各層面——尤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相關的——的符號排列組合：語言的符號觀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至此，後現代主義似乎已隱然成形；文學的社會學從此已經離不開結構主義了。

結 論

結構主義之所以能對整個二十世紀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它「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性格，和「科學研究」的精神。中文裡，佛家及道家，甚至是儒家，也都會談到這個哲學；但是結構主義的特點，卻是把整個細節鉤勒出來——它最重要談的，就是文字符號所帶來的「差異性」問題，人為制約的問題，系統性和互動性的問題——總而言之，就是知識中所謂的「結構性」的問題。在後現代的看法裡頭，結構主義的主要用途早已不再局限於五零至七零年代的結構主義敘事學（narratology）了，它已經超越了那個階段，而被拿來運用

¹⁸ 威廉斯在書中的原文是這樣的：“But one new method is now emerging, which can be felt as original in a number of fields. For if we have learned to see the relation of any cultural work to what we have learned to call a ‘sign-system’ (and this has been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semiotics), we can also come to see that a sign-system is itself a specific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ternally’, in that the signs depend on, were formed in, relationships; ‘externally’, in that the system depends on, is formed in, the institutions which activate it (and which are then at once cultural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tegrally, in that a ‘sign-system’, properly understood, is at once a specific cultural technology and a specific form of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those apparently diverse elements which are in fact unified in the material social process. Current work on the photograph, on the film, on the book, on painting and its reproduction, and on the ‘framed flow’ of television, to take only the most immediate examples, is a sociology of culture in this new dimension, from which no aspect of a process is excluded and in which the active and formative relationships of a process, right through to its still active ‘products’, are specifically and structurally connected: at one a ‘sociology’ and an ‘aesthetics’” (140-41).

在批判我們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結構性現象上面，叫做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最重要為人所知的學派就是解構主義。針對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認為，革命性的發明，是它完全顛覆了結構主義辛苦建立的二元建構，因為解構主義認爲，二元建構的完成，就是解構的基礎，因為能指固然是透過差異性才產生所指，所指卻也一樣，是透過差異性使我們聯想起能指之間的差異能量。¹⁹這種所指與能指一樣，具有同樣的封閉又開放的性質的看法，讓只重視能指的結構主義者哭笑不得。人們開始懷疑，結構主義是不是至此算結束了？我卻不這樣認為，我們得回頭想：沒有結構主意，哪來的解構主義呢？解構者愛談的「分延」（*différance*），基礎還是結構主義的差異性，因此不能說結構主義已經被解構主義「解構掉了」，沒用了。況且，最重要的，結構主義對其它理論的影響，大到無與倫比，光談解構主義如何「終結」結構主義，並無法窺得它在二十世紀發展的全豹。就拿拉康的經神分析學來說，那也是後結構主義的重鎮，沒有結構主意，精神分析學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發展上，恐怕大大的有問題，而羅蘭巴特所談的結構主義，也被認為已經超越了能指與所指的相對問題，進入了所謂的「話語」（*discourse*）範疇，意即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討論，意義的生產，本身都是所指的差異性過程，不是絕對性的，而是相對性的。所以什麼是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就是將結構主義拿來加以運用，進而超越了結構主義當初所關心的範疇。因此，除了解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伊果頓談的「政治批評」，甚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很多部份，也都可以看成是後結構主義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我們好像不能說，結構主義在什麼時候，由於什麼事件的影響下，被結束了。當然，後結構主義發展到後現代，已經被後現代所「吸納」，因此「文本掉了」。研究是結構主義者的專利的這種想法，恐怕恰巧在一九八零年代——就是大約伊果頓寫他那本被廣泛閱讀的《文學理論導讀》的時候——就已經被揚棄了。

¹⁹ 布列斯勒（Charles Bressler）談到這一點，可引為參考：“Derridean deconstruction begins with and emphatically affirms Saussure's decree that language is a system based on differences. Derrida agrees with Saussure that we can know the meaning of signifiers through and becaus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ifferences among themselves. Unlike Saussure, Derrida also applies this reasoning to the signified. Like the signifier, the signified can also be known only through its relationships and its differences among other signifieds. Furthermore, declares Derrida, the signified cannot orient or make permanent signifieds. The meaning of the signifie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is both arbitrary and conventional. Accordingly, signifieds often function as signifiers” (104).

參考書目

-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London: Oxford UP, 1953.
- Appignanesi, Richard, and Chris Garratt. *Introducing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UK: Icon, 1999.
- Barthes, Roland. “The Structuralist Activity.” Ed. Hazard Adams.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Irvine, Ca.: U of California P, 1971. 1195-99.
- Barthes, Roland.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roux, 1974.
- Bennett, Tony. *Outside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Best, Steven,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 Bressler, Charles.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3.
- 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P, 1975.
-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83.
-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66. English trans.: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 Harbage, Alfred. *Shakespeare's Audience*. New York, 1941.
- Lévi-Strauss, Claude. “Incest and Myth.”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 Ed. David Lod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72. 545-551.
- Lévi-Strauss, Claude. *The Savage Mind (La Pensée Sauva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 McLellan, David.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Oxford UP, 1977.
- Palmer, Donald D.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for Beginners*.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1997.
- Palmer, Richard E.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MacMurray College, 1969.
- Propp, Vladimir.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exas: U of Texas P, 1968.
- Sarup, Madan. *Jacques Laca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44-79.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 Wade Baskin.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 Selden, Raman, and Peter Widdowso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97.
- Want, Christopher, and Andrej Klimowski. *Introducing Kant*. London: Icon, 1999.

-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6.
- Williams, Gordon. *A Dictionary of Sexual Language and Imagery in Shakespearean and Stuart Literature*. 3 Vols.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 Athlone, 1994.
-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77.
- 王國芳和郭本禹。《拉岡》。台北。生智。1997。